

● 开放丛书

中青年学者文库

金涛集 观青峰刘

——反思·探索·新知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金观涛 刘青峰 集

——反思·探索·创造

金观涛 刘青峰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金观涛、刘青峰集

——反思·探索·创造

金观涛、刘青峰 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封面设计：陈少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5.5·字数333千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6-0370-5/C·3 定价：5.10元

目 录

序.....	(1)
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4)

第一辑 历史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	(13)
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69)
第一章 一个古老的难题.....	(69)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	(84)
第三章 调节功能丧失：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111)
第四章 大动乱与社会崩溃.....	(130)
第五章 奇特的修复机制.....	(145)
第六章 周期性动乱与停滞性：超稳定系统.....	(158)
第七章 干扰、冲击与亚稳结构.....	(182)

第二辑 科学技术与古代社会

引言.....	(203)
科学技术的整体观.....	(205)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成长.....	(248)
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286)

第三辑 哲学

科学理性的金字塔·····	(325)
客观性与公共性·····	(332)
“客观存在”存在的条件·····	(339)
量子力学和认识论·····	(345)
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361)

第四辑 文学

太阳岛的传说·····	(385)
一、蝙蝠、台长和仪器·····	(385)
二、新的目光·····	(391)
三、石像将参与死后永劫的事业·····	(398)
四、梦游者的世界·····	(412)
五、关于迷惑的启示·····	(425)
六、卡片上的生活·····	(432)
七、母腹中的骚动·····	(446)
八、阴影的海·····	(455)
九、孩子不可能是石像生的·····	(468)
十、他还不会笑·····	(479)
徬徨·思考·创造 ——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	(482)
科学·文学·形式·····	(487)
过去的手记·····	(489)

序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某天，陆上的兽类和天上的鸟类发生大战，蝙蝠有一对翅膀想加入鸟类阵营，又因为长得象老鼠，不得不投奔兽类，结果被两边所拒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也会处于类似蝙蝠的境地。

当人们问我们：“你们是研究什么专业的？”我们往往相视一笑，不知回答什么才好。我们也说不清自己的研究属于什么领域。有时只好说：“我们是编辑。”

在学术上，我们的代表作应该算是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但从工作性质来看，这只能算我们的业余爱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入史学界圈子。《公开的情书》于1980年发表后，赢得不少读者。而早在小说发表前数年，我们就远离文艺了。文学界也与我们无缘。

差不多所有不认识我们而又读过我们若干书的人，都以为我们是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我们声明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时，他们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个全国最高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我们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属于社会、人文学科的。

海外有的学者说我们固守马克思主义不放，为之惋惜。国内某些人则撰文斥我们为“非马克思主义”，发“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

这一切，似乎有些荒唐，令人啼笑皆非。我们似乎游离于现存已划分好的专业之外，徘徊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甚至于文艺之间。也许，我们曾经向往过成为某一创造性学术团体的一员，但又很难进入那些行会般的学会。这时，我们就想起了蝙蝠的苦恼和孤独。时光流逝，望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们明白自己已不算青年。内心的孤独有增无减。

专业划分，学界营垒，工作单位，似乎都不能套准我们。有的朋友为我们着急，早几年就对我们说：“你们得打下一块地盘了。”可至今我们仍在流浪。有次我们问儿子：“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他干脆地回答：“搞自然辩证法呗！”“那么，什么是自然辩证法呢？”“写文章呗！”在儿童那里，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单纯。也许，用“写文章”三个字来概括我们是不会错的吧。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埋头耕耘，生活在不断创造的精神世界之中。可叹所获不多，常常为自己创造力的枯竭而焦虑。我们一向认为，作品一旦走入社会，它们就和作者分离了，只能褒贬由人。影响和名声并没有打乱内心的平静。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接受符合规范的学术批评，承受非学术的漫骂和攻击。

去年，我们回国不久，老朋友唐欣打来一个电话。他说，希望编一个能代表我们思想的文集，放到“青年思想家文库”中，并自告奋勇写序言。我们感到为难。我们的作品已印过不少版本。1986年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我们的《问题与方法集》。我们没有什么新东西好收了。我们便支吾过去。放下电话，这件事也便淡忘了。前两天，突然接到这套书的主编的信，又提起这件事。通过两次电话，了解到集子是“资料性的”，而且得要得很急，我们便同意了。

为了表现我们“两栖人”的特点，我们把这个集子分为四部分。第一、二部分收录了我们在历史研究和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最主要的

工作。第三部分是哲学。本来还想收一两篇金观涛的纯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考虑到占篇幅，未收。第四部分是文学，主要是写于文革后期的文学作品。这里登出的《太阳岛的传说》，可能不象《公开的情书》那样好读。还有一点儿原先不准备发表的散句。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是金观涛的爱好。刘青峰不喜欢哲学，曾经喜欢过文学。说“曾经”，是因为搞搞文艺写作，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编完这个集子，觉得它与《问题与方法集》不一样，读者也会发现这一点。

我们希望这个集子会给某些青年读者以鼓舞：不要因为自己不是专家而泄气。只要我们认真地独立思考，勤劳地工作，那么，青年时代曾经召唤过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虚幻的。虽然每个人不得不进入中年，虽然大多数人应该成为专家或专业能手。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应该保存着青年时代的一片百花盛开的园地。我们不怕幼稚。

金观涛、刘青峰

1988年3月25日 北京中关村

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反使命感的情绪高涨

今年七月，离开美国前夕，我们给一位旧金山的朋友临别赠言是如下几句话：

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这位朋友和我们都深感在当今世界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在美国期间，每当我们和一些年轻的学者（无论来自大陆还是台湾）谈起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感问题时，大多数青年学者以为那是一种过时的幻梦。我们的一位研究经济的朋友竟然极端地说：“要是某一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抛弃了使命感，中国就有救了！”这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了解他文革中苦难的经历，所以认为这只是他对过去太过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动。回到北京后，使我们意外的是：否定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不仅是个别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在青年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性的趋势。我们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组有关知识分子参与意识的讨论。一位学者对当今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的消失深感痛苦。另一位则在哲学上反复论证使命感过强对民族未必有益。我们马上猜想，前一位一定四十岁上下，和我们是同龄人；后一位则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向朋友一打听，我们的猜测果然不错。现在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态度大约是可以用来划分的。这使我们想起那位朋友那极端的言论绝非个人情绪之偏激，它代表了青年一代对使命感之反省以及他们彻底的反传统的心态。

我们想，对使命感的非难归结起来，大约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人们深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缺少西方的个人主义。直到今天，西方的 Privacy（隐私——编者注）之类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很多青年学者认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过强而压制了个性和创造能力之发展。另一种意见是从价值观念的社会功能出发来解剖使命感。人们普遍认为，专业精神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无论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还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之兴起都和一大批新型的献身于自己专业的知识分子出现密不可分。而在中国传统中，正好存在着普遍的“反专业”倾向。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医生、天文学家、数学家、工程师、还是画家、书法家大都是官僚绅士，专业兴趣只是他们的一种兼职或叫业余兴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决定下再来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因此，一些学者甚至用“业余精神”来描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专业的态度。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观点确有自己的道理。使命感和个人主义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是否真的压制了专业精神的成长，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对青年知识分子反使命感情绪之高涨深感忧虑。这倒并非因为我们至今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不同意对中

国传统文化来一个彻底的反省和批判。我们担忧的是：这种基于中西文化局部性分析的情绪化的思潮会把我们引向歧途。

反省与改造的整体观

我们一直是文化的整体论者。我们认为，在文化系统的观念层和非结构性部分，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 and 变更的余地。我可以比较容易地抛弃那些看来已不适应于现代生活的部分，并吸其他文化之精华，将其捏合呈现多元文化的现象。但是在文化的层结构中，我们原则上做不到去掉某一部分而保留另一部分。今天人们都意识到我们对传统文化反省的重要性，这恰恰表明，对深文化结构之改造本身所需要的正是使命感。缺乏使命感，我们将以越过专业的障碍而看到当今中西文化所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在未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改造上，简单地否定使命感，对西方专精神采用“拿来主义”的主张，也许会以“播下的是龙种，但收获却是跳骚”而告终。

就拿西方知识分子的专做精神来讲，它们和深层文化结构有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至今历史学家还不太清楚，西方知识分子专业精神是怎样起源的。很多学者都指出过，西方知识分子的专精神 and 古希腊时形成的爱智求真的传统以及中世纪后期新教伦理的“天职”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韦伯的理论正确，那么原则上们不能把专业精神和基督教文化深层结构分离开来。在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中，认为人若想得到上帝的恩宠，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职业劳动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无疑有助于专业精神的成长。我并不认为，现在对专业精神和西方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已搞清楚但韦伯的研究至少已经证明，当我们看到西方知识分子一辈子沉自己的专业而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时，切不要忘记去分析他们为

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献身于自己的专业只属于较低层次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人很少仅能以此为满足的。如果人的宗教信仰、人生意义等更高层次价值问题没有解决，而一辈子沉陷在专业中，就往往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失落感和不道德感。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对道德伦理、终极关怀等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作出它本身内在而合理的回答时，包括专业精神在内的其他精神规范，才有可能牢固的。傅伟勋教授曾把人的价值取向分成十个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层面。根据这种分法，专业精神大约只属于“历史文化”和“知性探索”等较低层次，而只有“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真实”才是最高最深的层次。我们认为，傅教授把人的精神各层次价值取向看作内在关联的整体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无论新教徒把“天职”看作实践自己信仰的手段，还是当今西方知识分子二元论的世界观，这些都是使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自己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系统相谐调的表现。而在终极关怀和人生价值层次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一旦我们转换了参照系，那么认为只要否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会造就专业精神的想法就显得有些肤浅了。

参与意识的两个极端

我们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的研究必须进入更深层次。学者们普遍认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并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在西方只是现代的事情，但在中国，从参与意识上讲，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一直十分接近。这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的特殊性。从价值观的基本构架来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确实是颇为奇特的。自古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并不认为人自身的

行为准则可以由他们自己来作出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中抽出作为恒生命意义的伦理信条。而中国古代哲人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大畏。他们从人自身出发，认为生命的意义可以从道德实践中得到持，道德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他们并不需要把神喻作为伦理的来源相反地，而把伦理看成文化的来源。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两种化在古代和现代所面临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始终萦绕于现世社会，他们在自己有的生命中追求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践以及个人道德之完善这种深层的价值结构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只可能在社和个人两个端点之间选择。一种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识分子具有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把自己的参与意识注入到社会家庭各个方面。另一种表现是消极无为，把终极关怀落实到独善身上。他们很难做到像信仰新教伦理的西方知识分子那样，使自的参与意识严格限制在专业领域同时又可以保持心理的平衡。

舍使命感则别无选择

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正遇到挑战。传统价值的合理性处于人的普遍怀疑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西方文化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改造。尽管如此，无论未来的新文化是么样的建构，我们仍然认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人终极关怀恐怕还是来自于人和社会，这大约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征。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或能够）摆脱使命感，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当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只要中知识分子拒绝相信上帝的存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能确立类似于西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个人主义。我们想再三强调的只是：为了展个人的创造性和建立健全的专业精神，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不

抛弃理想主义和责任感，而是在文化使命感的指引下去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结构。

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常常充满了歧途。有时，那些表面上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其实是最传统的。历史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规定了知识分子的深层价值取向表现在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这就造成了一种表现在参与意识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向的独特现象。每当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受挫或看破社会的腐败时，往往就会逃避现实，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而对使命感反感至极。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我们曾经引进一个概念来讨论古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在两个极端跳跃的现象，将其称为“互补振荡”。我们认为，只要一种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两个思想方式类似，仅在参与意识（有为、无为）上相反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结构互补。在中国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正好构成一种互补结构。互补结构最常见的现象是：当这种文化受到外来冲击或挑战时，知识分子就纷纷转入互补结构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去追求创新。互补振荡带来文化体系的巨大保守性。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儒臣、儒将、儒医到隐于山林道观的隐者、道士、居士的转变，是轻而易举、不胜枚举的。今天青年学者对使命感彻底否定，是站到了文化整体观上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反思（其实这本身必然表现出另一层次上的使命感）呢？还仅仅是重复古已有之的“互补振荡”呢？我们认为，这是应该警惕的。二十年前，阿德诺（J·W·Adorno）曾讲过：“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今天，为了让理性之光照亮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结构，为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获得整体性、创造性的重建，我们认为，首先要让青年知识分子了解民族文化的苦难和它面临的挑战。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重新唤起新一代人的使命感外，我们将别无选择。



第 一 辑

历 史

